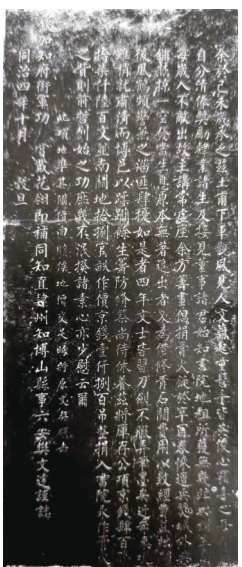


石碑里的民生意识

——博山碑刻文化蕴含的民本理念探析

徐春晖



《范泉书院记碑》拓片

博山地处鲁中腹地，一向以经济富庶、文化繁荣著称。博山自唐代开始挖掘煤炭，宋时生产陶瓷琉璃，至迟到明代中叶，博山已经成为全国琉璃生产销售中心。千百年来，煤炭、陶瓷、琉璃三大产业的不断发展，不仅奠定了博山作为鲁中重镇的地位，也带动了饮食、手工、农林、教育等其他行业的发展。繁荣的经济促使博山地区社会变革加快，社会活动增多，而碑刻作为“传之万世”的有效载体，被广泛应用于地区各类重大社会活动中，博山也因之留下了数目众多的碑刻。

2013年，博山区政协启动博山域内碑刻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于2014年编辑出版《博山碑刻》一书，该书收录了349通碑刻，83通摩崖石刻、石额、石雕等，376幅照片，265幅拓片，共31万余字的碑文，大体囊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博山碑刻的基本情况。从该书所辑碑刻分析，博山碑刻大多以寺庙修建记碑为主，另有不少碑刻则具有明显的社会教化、行为规范等内容。碑文中所蕴含的民生民本思想，对今天的地方民生建设和良好社会风尚普及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就该书所辑碑刻，择取社会民生方面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禁止樵采 以育山林

该类碑刻以封山育林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当地先民保护自然、利用自然的超前生态保护意识。其中最早的为明万历三年（1602）的《禁止采伐林木告示碑》，该碑现存于博山凤凰山泰山行宫，石灰石质，高70厘米，宽98厘米，正文楷书，字径3厘米，碑体完整，文字清晰。时任颜神镇（博山前身）捕盗通判的赵存诚重修泰山行宫，第二年修建完成。为保护泰山行宫及周边环境，赵存诚特立《禁止采伐林木告示碑》，提到行宫“四至中凡有树株，宜速生长，克行官用。居民敢有牛羊作践、斧斤砍伐者，庙主呈官，枷号重责，赔偿问罪。”虽然立碑主观目的是保护庙宇财产，客观上却保护了山林植被不被破坏。

此外，《博山碑刻》一书还收录类似刻碑十余通，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到民国三百余年，地理分布则遍布博山全境。这些刻碑所记载禁止乱砍滥伐树木事项，大多是为保护一地风水不被破坏，如现存于伊家楼村的同治十三年（1874）《封山告示碑》即明确提到：“该处太平山系伊等各庄风水攸关之处，其中草莽草茂，嘉木葱茏，培养有年。屡经封禁，不准樵采作践，以资荫护而壮观瞻。”现存于龙堂村民国十九年（1930）的《护林记碑》碑文则对保护树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其开篇即强调：“夫树者，经画必资，衡宇必植，莹墓必设。经画资以识道，衡宇植以识家，莹墓设以壮观瞻、着兴替，实先人凭之也。”而民国二十年博山县建设局在岳阳山设立的《布告记碑》则抛开风水保护之说，直接点明：“岳阳山为博邑名山，向有多树，蔚为森林。近数年来牛羊践踏，樵夫斫伐，以致山不美，若不早为保护，势必成为秃顶。”因建设局负有保护森林之责，因此布告附近村民不得上山砍伐放牧，说明本地对山林的生态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千百年来，博山地区居民靠山而居，依山而存，多数村庄也都依山而建，村民和山形成了共生共存的紧密关系。他们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出发，知道山林对保护山体、保护民生的重要作用，上述碑刻则是他们生态保护意识的直接证明。

捐助助学 赅续文脉

博山地区历来非常重视教育，《博山碑刻》也收录了历代捐资助学刻碑近10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捐修范泉书院的相关刻碑。

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石学家武亿出任博山县令后，对原范泉书院进行重修，恢复了范泉书院的教育事业。半个世纪后，范泉书院因经费紧张面临关闭。道光二十三年（1843），博山前知县何家驹与知县邱文藻等人倡议为范泉书院捐资，据《清道光二十三年创建书院善人题名记碑》记载，前后有三百多人参与了集资，捐资从几百文到最低一文不等，筹集资金一万两千零四十三三百文。这些钱款除修理书院墙宇及相

关附属设施外，还购置土地，入股当铺等，确保了其后续资金的延续。

同治初年，博山地区战火频仍，书院经费也入不敷出，部分主讲人员常常缺席，书院形同虚设。同治四年（1865），知县樊文达从官府经费中挪出部分费用补贴范泉书院，使其恢复教学。据《范泉书院记碑》记载，樊文达“将库存公项京钱四百七十六百文，并南关地十八亩官，作价京钱一千八百吊整捐入书院，永作膏火之资。”光绪年间，监院李禹峰又捐款一千一百缗，以助书院膏火，此时书院“设监院数人，山长一人，每月课士二次……每课生员约二十余人，童生约五十余人。”十年后，清廷罢科举，范泉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

从乾隆年间到光绪末年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范泉书院为博山文化教育做出巨大贡献，博山的莘莘学子经范泉书院栽培而名垂青史者甚众。现存于博山范公祠的这些记碑则是博山历代重视教育事业的最好证明。

除修建范泉书院外，《博山碑刻》还收录了其他地方捐修书院的刻碑。如山头窑广村宣统三年（1911）《真武庙改学堂记碑》、山头东坡村民国十九年（1930）《小学教室记碑》等记碑，则记载了博山本地乡民就地取材建设学堂之事。从以上记碑可以看出，每次倡捐修建学堂时，博山先民都积极踊跃捐款，不仅捐款人数众多，所筹资金亦极为可观，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乐善好施的公德之心。

革税安商 恩泽黎民

博山地区在明朝中叶就成为鲁中地区有名的经济重镇。经济的繁荣富庶一方面促进了博山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也为不法官员、商人大肆敛财创造了可乘之机，“胥役地棍人等冒名抽税，扰害小民”，“蠹棍横索，商民不安”。为此，博山本地直乡绅曾先后几次干预不合理税收，清肃市场，为保护本地百姓利益、促进市场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博山现存最早的有关税制改革的碑刻是康熙十年（1671）的《革税记碑》。据碑文介绍，康熙十年，巡抚部院禁止滥设牙行以后，本地乡宦、时任广东阳江知县的孙廷铎特呈文颜神镇巡检司巡检王谦亨，建议整顿颜神地区陶瓷行业重复收税问题，王谦亨听取了孙廷铎建议，于当年四月十四日在税务衙门立碑，由此保证了博山地区陶瓷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博山地区有关税制的碑刻中，当属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赵宦买税记碑》影响力最大。该碑宽72厘米，高164.5厘米，厚20厘米。正文楷书，字径1.5厘米。碑体完整，文字尚清晰。该碑主要记述了康熙中后期博山地区官商勾结“私立行款，显背司册，取余民间，不啻数倍，以致万姓嗷嗷，集场几废”。为保护博山集市正常运转，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二十四日，赵执信、赵执遂上书认捐秤尺等九个行业执照，并将集市设为义集，集市内所有商贩无须再缴纳任何费用。呈文经县、府、道层层审批，遂同意赵执信、赵执遂捐税集呈文，并于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一正式实施。后为防止有“胥役地棍人等仍敢冒名抽税，扰害商民”，又于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勒石立碑，以垂久远。

赵氏兄弟买断行税后，博山地方手工业很快就进入了良性发展。硝是琉璃产业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长期以来，硝的生产、销售都由官府和少数人垄断，一定程度上桎梏了琉璃行业的发展。硝行免征税后，可自由买卖，博山地区琉璃行业也因此更加繁荣，逐渐成为博山的支柱性产业。可以说，博山琉璃行业的繁荣与赵氏兄弟买税有直接关系。

除以上三类碑刻外，《博山碑刻》一书还辑录建桥修路、施田捐地、增筑石堰等各类涉及民生的碑刻二十余通，时间跨度从明天启年间到民国末年；全书收集有关民生事项碑刻计有60余通，占比近五分之一。从以上碑刻可知，历史上博山地区的乡宦士绅对社会民生都较为关注，他们通过立碑方式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基层安稳、提高百姓素质，最终保障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碑文中所蕴含的生态保护、人伦教化、法治宣扬等内容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鲁南地区最早的抗日纪念碑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

刘舰

在山东省邹城市城前镇渠家庄村南100米苗子岭上，屹立着一通抗日烈士纪念碑，碑呈梯形方柱体，青石质，顶部为覆斗状，高2米，上宽0.4米，下宽0.55米，碑座呈方须弥形，花岗岩石质，高0.5米。碑阳左边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立”，正中镌刻“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右下署“彭畏三敬题”，为时任鲁南参议会参议长的彭畏三题写；碑阴铭刻碑文8行，计408字，后署“尼山区全体党政军民公立”。

彭畏三（1901—1969），今山东省滕州市人，1923年考取北平师范大学，1927年毕业于后从事教育工作，积极参与营救和资助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多次支持和保护进步青年学生。“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6月，彭畏三进入鲁南山区。1939年底，受聘担任八路军115师高级参议，成为罗荣桓同志的高级顾问。后继任鲁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鲁南行署教育处副处长、鲁南参议会参议长。194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

鲁南区议会，由鲁南区党委于1940年6月组织召开400余人参加的鲁南各界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选举彭畏三为参议长。1943年冬，其时尚为民主人士的彭畏三题写了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碑阳碑文。

纪念碑碑阴碑文如下：“尼山区为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屏障，自敌人控制津浦线后，即向其频繁进攻。复有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之流，与之配合。遂使坚持是区之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及人民陷于两面作战之困境。民国廿八年端阳节，八路军四支队一部与日寇激战小山，以寡敌众，冲杀终日，高呼‘与小山共存亡’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声振山谷，令人泪下。迄今信女犹说是在日晡香敌茶以慰忠魂，其壮烈感人，有如此者。廿九年敌伪顽匪配合进攻，形势极恶，当时党政军民仅余十八盘山可作抗拒依托。后经苏鲁支队驰援救致，终获坚持阵地之胜利。去秋敌人加紧蚕食，我鲁南军区主力配合尼山独立营一鼓而下孙徐，生擒汉奸惯匪张显荣，为尼山奠定巩固之基础。至若罗头伏击，长崖突围，奇袭深沟之敌，打进泗水南关、收复标村、赵家村，奔袭垵山、将军堂，均以烈士之热血头颅换取扩大与巩固尼山区之辉煌战果。众信无先烈之牺牲便无今日之尼山区。故后死者应照顾其家属，继承其遗志。在民族革命斗争中发挥友爱无私之精神。尼山区敌具盛德之规模矣！然反攻胜利建国成功尚待最后之努力。爰勒斯石以颂坚贞而励来兹。”

尼山区全体党政军民公立碑阴碑文中记载了激战小山、坚守十八盘、生擒汉奸张显荣等重要战斗和尼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

1939年6月13日，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抽调1000余人组成的南下挺进支队，抵达邹东一带。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挺进支队二连178名勇士与日伪军2000余人在小山激战，战士们同仇敌忾，战至最后，高呼着“与小山共存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与疯狂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后在主力部队策应下，部分指战员

冲出了重围。此战毙伤敌伪200余人。我军营教导员王志耕、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玆等83名烈士牺牲。当地百姓感念八路军的英勇，每年都在端午节到小山焚香献茶，以慰忠魂。2018年，当地建设了高19.39米的小山战斗纪念碑，以永久纪念这次战斗和牺牲的烈士！小山战斗是八路军在邹东地区打响的第一战，点燃了邹东地区的抗日烽火，扩大了南下挺进支队的政治影响，有力促进了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40年，以十八盘山为中心的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1940年9月14日，国民党滕县顽军头子申宪武探知只有邹县县长步云亭所率县大队在尼山区，于是勾结邹县、泗水等地数股顽军2000余人进犯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接到求援后，立即命令苏鲁支队政委彭嘉庆带领苏鲁支队一个大队前去救援，指示务必站稳脚跟，打击敌人，然后向邹滕泗地区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9月15日凌晨3时许，急行军赶到的苏鲁支队与邹县县大队里外夹击，毙伤敌百余人，俘敌百余人，粉碎了敌顽军扼杀鲁东抗日武装的阴谋，保住了尼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种子，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显荣原是活跃在尼山区的土匪，后于1942年春公开投了日军，当上了“皇协军”司令。司令部驻扎在泗水城南5公里的南北孙徐，所部2000余人分驻在周围的30多个村庄。泗南广大地区被伪化，对尼山抗日根据地威胁极大。1942年9月4日，我115师教导第三团和尼山支队，深入敌腹地，采取长途奔袭的掏心战术，一举攻克了驻扎在南北孙徐张显荣司令部。南北孙徐之战，毙伤伪军200余人，生俘伪皇协军司令张显荣以下500余人，其余部随后溃散。解放了30多个村庄，使泗南、邹东连成一片，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士气，为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碑左右两侧面刻有为国捐躯的167位抗日烈士姓名、籍贯。通体碑文楷书书写，字体雄浑苍劲。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立于1943年冬季，是鲁南地区最早的抗日纪念碑。尼山区是鲁南抗日根据地之一，范围以邹东山区为主，包括曲阜、滕县、泗水、费县、平邑等县结合部，当时中共鲁南地委、尼山行署、鲁南一分区、邹县县委均设于此。在立碑时期，尼山抗日根据地又迎来了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尼山军民认真总结回顾了6年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的斗争历程，为缅怀为国捐躯的英烈，追悼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特勒石记功，真实生动记载了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等几方势力夹击下生存发展壮大历史，是当时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由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领导下的军民书写的抗战史的宝贵一手资料。纪念碑还是二战时期留存的珍贵历史文物，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及抗日战争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史价值。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立于抗战时期，是目前发现现存较早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



日军民所立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之一，它记录了当时为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建设牺牲的167位烈士英灵，讴歌了尼山区军民在抗战时期的壮丽场面和英雄事迹，彰显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伟大精神，以激励后人铭记先辈历史功绩，弘扬先辈革命精神，对于传承抗战精神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立碑之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以后逢重要节日都到此碑所在地举行祭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纪念碑成为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设施，每到清明节、“七一”建党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附近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等在此举行活动。2016年始，邹城市依托尼山区抗日纪念碑，建设了尼山区抗日纪念馆、尼山区抗日遗址复原展示区等，成功打造尼山区红色教育基地，先后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党史教育基地、山东省红色研学基地、山东省第三批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发挥着重要的观瞻、教育功能，具有重要的景观价值和社会价值。

1982年，在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上加盖了六角小亭。1985年4月，被公布为济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6月，被公布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2月，入选山东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2019年2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以纪念碑体为基点，四周向外8米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外缘线向外延伸5米为建设控制地带。纪念碑现由邹城市城前镇文化旅游办公室管护。在碑前立有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和山东省革命文物标识牌。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至今已历经80余年风雨，为做好其保护利用工作，一是借助正在开展的第九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建议将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纳入国保范畴，进一步彰显其价值，以促进保护展示工作开展。二是加强研究阐释工作，对纪念碑的作用、价值、背后的故事，碑文中记载的英烈、事件等进行深入挖掘，讲好革命故事、红色故事，为文物利用工作奠定基础。三是进一步发挥纪念碑启迪教化、立德树人的功效，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以进一步保护历史文物，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西汉伯乐相马画像石

郑建芳



方阜的一段佳话：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若者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千里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囊薪者，曰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对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秦穆公看到伯乐年事已高，便询问伯乐的子姓中有没有得到伯乐相马真传，可以派去寻求天下好马的人，伯乐回答道，好马总是可以从它的形状和筋骨上去察看和分辨出来的，而天下难寻的千里马好像没有什么标准，也令人难以捉摸。他向秦穆公推荐了九方皋，九方皋所相中的马，连马的毛色、性别都搞不清楚，这让秦穆公很失望。伯乐长叹说，九方皋相马不在乎马的毛色、性别，而注重马的内在品质，这种看问题要抓住本质，不只看表面现象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古代文献典籍中还有多处类似伯乐相马故事的记载。《韩非子·说林下》：“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驽马。千里之马时一，其利缓；驽马日售，其利急。此《周书》所谓下言而

上用者惑也。”以伯乐相马作为例证，来说明一定的道理。《战国策·燕策》：“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骏马待伯乐至而增价，说明了伯乐发现和荐举骏马的权威性。《楚辞·九章·怀沙》：“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强调了骏马对伯乐的依赖性。西汉《韩诗外传》：“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突出了伯乐对于发现培养千里马的重要性。到了唐代，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杰出文学家韩愈，托物寓意，借马说理，写出千古名篇《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名句，在赞叹伯乐识马之道重要性的同时，更让伯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直延续至今。

伯乐相马画像石，目前国内发现数量较少。该画像石生动再现了伯乐年迈即将离任时，高风亮节、慧眼识才，推荐九方皋相马的历史事件，它以雕刻与绘画的形式将伯乐相马、九方皋相马最直观、最生动、最具体的形象，定格于石质载体，留下了难得一见的画面。加之凿刻的平面阴线刻的娴熟雕刻技法，在石面上留有了密集鱼鳞状或细密平行线纹，让整个布局简洁疏朗、鲜明醒目，构图饱满均衡、细致绵密，充分展示了一种古朴自然、豪放浑朴的气势美，使得人物形象各具形态，活灵活现跃然石上，赋予了石块新的生命力和活力，极具地域特色。

伯乐相马画像石的发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相马故事的喜爱，它折射出的认识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的哲理，经过历代贤达颂扬、诠释、提炼、升华和传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